

区域经济学博士文库

转型成长中 区域突破现象的制度解释

姜安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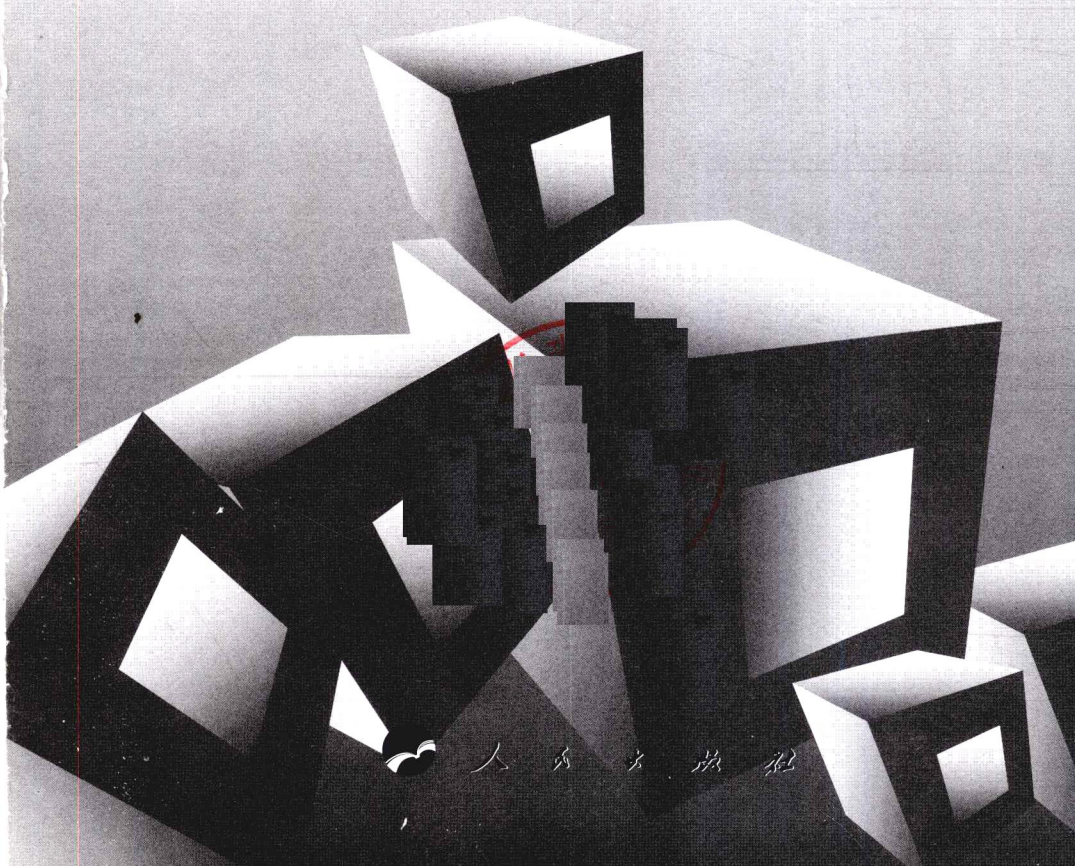


人民出版社

区域经济学博士文库

转型成长中 区域突破现象的制度解释

姜安印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 芬

封面设计 王 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型成长中区域突破现象的制度解释/姜安印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2

(区域经济学博士文库)

ISBN 978-7-01-006889-3

I. 转… II. 姜… III. 区域经济-经济制度-研究-中国 IV. F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9358 号

书 名 转型成长中区域突破现象的制度解释

ZHUANXING CHENGZHANG ZHONG QUYU TUPO XIANXIANG DE
ZHIDU JIESHI

作 者 姜安印 著

出版发行 人民出版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6)

邮购地址 北京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88 号

鸿安国际商务大厦 C-1201 邮编 100010

邮购电话 (010)65181955 (010)65224882 转 812/813

印 刷 北京京宇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版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5.875

字 数 136 千字

印 数 0,001-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01-006889-3

定 价 14.00 元

前 言

转型经济中的“中国经验”有着众多迷人的现象,本书以其中的区域突破现象为研究对象,对“中国经验”从一个新的视角,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

本书的研究是基于对转型经验的总结基础之上的。在对转型经验的总结中,人们认识到我们对于身处其中的制度及其变迁知之甚少,但人们对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有了初步的了解,至少明白了制度是重要的,过去的制度积累同样是重要的;私有化同私人部门的成长是两个不同的过程;建立一个市场经济体制比建立一个计划经济体制要难得多,等等。

本书的研究是以“中国经验”的再认识为前提的。试验性、小型性、累积性、区域性是渐进式转型的特点,这些转型的具体特征中包含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成长性。从转型成长来重新认识“中国经验”,关键是要找到一个体制成长和经济增长的共同载体,这就是中小企业的成长。

以中小企业成长为视角,把制度变迁的逻辑放到制度的历史过程中去考察,把经济成长的逻辑放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去考察,按照这样的思路,本书通过对转型成长中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的论述,使中小企业在转型成长中的历史作用和地位得到了

进一步的凸显。中小企业成长在区域空间上的差异是形成区域突破现象的表层原因,在引入一个区位租概念的基础上,本书建立了一个中小企业成长—区域突破—转型成长的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的新意在于:在转型理解上,将其看成实现发展目标的一种战略选择;在转型解释上,将其看成一个自然的、历史的演化过程,转型经济中的成长性就是这一过程的展开。在这一展开式中,渐进式转型的体制成长是从边际上开始的,体制和经济的成长是以“新企业”成长为途径的,“新企业”成长中的区域聚集最终形成了转型成长中的区域突破现象。

目 录

前 言	1
-----------	---

导 论	1
-----------	---

一、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1

二、文献述评 /5

三、研究思路及逻辑框架 /13

第一章 转型成长：中国经济转型特征的新表述	20
-----------------------------	----

一、转型经济概念的嬗变 /20

二、从转型看成长：一个比较的视角 /27

三、从成长看转型：一个综合的观点 /46

四、小结 /64

第二章 传统体制边际是转型成长的逻辑起点	66
----------------------------	----

一、传统体制的边际问题 /67

二、转型成长的边际演进方式 /78

三、小结 /95

第三章 中小企业是转型成长的历史起点	97
一、企业理论的简单回顾 /98	
二、工业化与企业制度变迁中的中小企业 /107	
三、中小企业是转型成长中的市场中坚力量 /120	
四、小结 /141	
第四章 区域突破是转型成长的有效途径	142
一、区域突破现象的界定和描述 /142	
二、区域突破现象的制度解释 /157	
三、小结 /169	
结 语	171
参考文献	173
后 记	179

导 论

一、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转型成长中的区域突破现象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个引人入胜的研究课题,从制度视角对该问题展开研究,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一)一个引人入胜的研究领域

从经济史的角度看,人类社会已发生的且被人们认识到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四种:第一种是只有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少有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经济成长,它发生在近代以前的社会里,被称为“广泛性成长”;第二种是既有经济总量的增长又有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经济成长,它是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水平提高的结果,发生在工业革命之中,被称为“斯密型成长”;第三种是不仅有经济总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还伴随着不断的技术革命的经济成长,它主要是技术变革和组织创新的结果,发生在工业革命以后,被称为“库兹涅茨型成长”;第四种是在经济总量、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技术革命加快的同时,还伴随着经济制度变迁的经济成长,它主要是通过制度革命和创新来实现的经济成长,这种经济成长发生在后现代化国

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尤其是在计划体制的转轨时期,可将其称为“转型成长”。

在现代化进程中,后现代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长过程可描述为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二维空间中的一条曲线。本书所研究的转型成长是特指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中的一种独特的经济成长,即一个国家在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实现了体制转轨,这种特殊性可概括为双重成长,即同时实现了经济的成长和体制的成长。迄今为止,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小国成功地实现了这种转型成长外,大国中只有中国是一个例外。中国的成功被称为“中国奇迹”,国内外的经济学界已对其进行了大量的解释,但到目前为止,仍未形成一个普遍认同的解释体系。因此,从中小企业发展与区域经济成长的视角对“中国奇迹”作一新的解释,是一个既富有挑战又引人入胜的题目。

(二)转型实践迫切需要转型理论创新

对于身处转型之中的每一个人来说,转型首先是一种感觉。但理论研究不能停留在感觉的层面,因此,我们要给自己的感觉一个秩序,需要解释感觉,解释转型。面对中国发生的这场社会(制度)千年大变局,当尘埃并未落定时,所有的结论不管是赞扬的还是诅咒的,也许都为时尚早。但是现实迫使我们作解释。可能有人认为,当下最要紧的并不是解释,首要的任务应该是描述。人们首先应该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才能去解释和评论这样一个规模宏大、内容深刻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和社会规范的变化,只有从各个侧面去了解,在微观层次上去感受,才能有总体上的轮廓。而从经济学现在所能达到的高度来说,它能描述这样一个制度变迁已

经具有国际文献价值(盛洪,1996)。在笔者看来,中国的转型虽有着许多的与众不同,但仍没有超出现有经济学的解释范围,前提是不把经济学局限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围内,给这一“迷人”的现象作出部分的解释是完全可能的。那种认为一个转型证明了诸多失败的看法,是一种没有历史感的轻浮,经济的成长过程本来就是一个历史的、自然的过程。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大论战中,建立在瓦尔拉一般均衡理论基础上的兰格模型已经证明,如果计划当局充当瓦尔拉模型中拍卖人角色,根据供求平衡的原则,以“错了再试”的方式建立起一套均衡价格,计划经济会像市场经济一样,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然而,计划经济的实践表明,离开了市场过程,拍卖人(中央计划者)难以获得全面的有关资源、生产、供求等方面的经济信息,也难以获得与计划执行者努力程度相应的准确信息。正是畸高的制度运行信息成本,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这说明,离开了制度分析的经济理论,就会蜕化为一种智力上的游戏。

假如转型经济给予了我们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对于我们身处其中的制度,如果脱离历史,带着意识形态的偏见去理解,是不能真正解释转型中的制度变迁的。如果转型经济的所有争论引起了什么理论反思的话,那首先应该是回到古典主义,在分工的深化和交易的扩展这样的二维坐标下,重建经济成长的研究传统。只有这样,当我们在面对太多的彼此孤立、对立、冲突和互补的制度变迁理论时,才不至于步入“理性的驴子”的困境。只有转型理论能够真正解释转型的现象时,我们才不会被暂时的困难、一时的矛盾所困惑,也不会为局部的胜利所迷惑。由此可见,转型实践的发展迫切需要转型理论的创新。

(三)一个新视角的尝试

在中国的转型成长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具有鲜明特色的区域经济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模式,但大量的研究都局限在对个案和不同模式自身的解释上,使解释缺乏应有的抽象性和整体性。解决问题的可能出路有两条,一是针对体制成长过程的“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因素的互动分析中,“中间扩张”因素的一般分析是最薄弱环节,从中小企业的视角来研究转型成长是弥补目前研究不足的一个可以尝试的办法;二是目前国内的中小企业研究,大都是“解决问题”的话题,“解释问题”方面的研究较少。民营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制度分析方面的研究,侧重于非国有经济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制度环境方面,而对非国有经济发展对制度变迁作用机理的研究,最丰富的文献是关于乡镇企业产权制度变迁的研究,虽然这些研究为下一步研究准备了大量的素材,但同民营化是中国实现转型成长的主要途径这一事实相比,理论的一般提升仍显不足。这既阻碍人们在非国有经济发展对体制转轨作用认识上的深入,也导致在中小企业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关系认识上的片面性。因此,升华中小企业成长与体制成长的一般性研究,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努力方向。

在对中国经济转型经验的解释中,人们暗含的“对象”是那些在转型经济中区域制度变迁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先发地区。这些地区中有代表性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有“苏州模式”、“中关村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它们是在改革开放后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大背景下,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突出亮点,我们将其称之为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区域突破现象。这一现象的共同特征是,它既是某一改革阶段体制转轨的成长极,

也是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对于这些具有鲜明特色的区域经济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模式,目前理论界研究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在理论层面上,一是在中国经济转型的经验模式向理论模型的转化中,仅把经济增长和体制转轨当做双重的目标,对二者同时还是一种“共同成长”的事实重视不足;二是已有的经济演化理论还不足以构建体制与经济共同成长的动态理论,从而使转型经济对“成长性”的研究还受困于方法论而难以超越静态分析;在分析的技术层面上,缺乏“企业成长”的一般分析,是目前研究经济转型的较薄弱环节,也是导致制度变迁解释中政府、市场、企业相分离的主要原因。因此,基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具体经验,从中小企业成长的视角,以区域突破为切入点研究经济转型中的“共同成长”问题,是把“成长性”研究回归到原始的起点,是“成长”同具体的环境相结合的途径,是弥补目前研究不足的一个可以尝试的方法。

二、文献述评

(一)制度与转型方面的文献

1. 转型经济研究

不同的转型国家采取了不同的转型次序和转型速度,并导致了不同的转型绩效,这一现象给人们全方位地观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机会。但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理论观点上的分歧仍大于共识,虽然主流经济学早期的“制度可以短期改变”的观点得到了部分的修正,我们仍可以认为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共识只有“制度是重要的”这一点,或者再加上“有限条件下制度

是渐变的”这一点,在其余的所有方面,不同的学派都有各自的主张和观点。按照对转型经济路径的研究方法上的区别,可以把转型研究概括为四类:一是将转型与速度联系起来,用速度进行分类和价值判断;二是将转型与其过程的成本—收益联系起来,以最小成本或最大收益来分类和进行价值判断;三是将转型与预先设定的目标联系起来,并以这一目标作为可观察的指标来进行分类与价值判断;四是将转型同政治体制的变革联系起来,以是否改变政治体制作为分类和价值判断的标准(吕炜,2005)。这样的概括其不足之处是各个类型之间的跨度较大,也忽略了各种类型在部分观点上重叠的一面,但就不同研究方法在转型的起点、路径、目标上的区别而言,仍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划分办法。

当转型研究已成为一种学科时,对这一领域的文献作简单的评述是一件难度较大的工作。就目前的转型研究而言,主流经济学的范式仍是其主要的研究特征,制度分析的研究思路影响在逐步强化,但大部分制度分析仍在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下进行,对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仍缺乏基本的解释框架。无论是“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无非都是对转型经济的表象特征的一种解释。“北京共识”虽然看到了“中国经验”中“渐进”的一面和它的建设性,但对包含在“渐进”中的成长性并没有给予必要的关注。

2. 制度变迁理论

由于制度经济研究领域是一个派别林立、方法各异的大杂烩,不同的学派有各自的制度变迁主张,所以,这一领域的文献资料的庞杂程度并不亚于转型研究领域,或者说正是制度分析上的范式多样才导致了转型研究的观点众多。我们仅以制度分析的基本概念演变的角度,粗略地将这一领域划分为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不完全合同理论、自发秩序理论、宪政理论、路径依赖理论、

认知模式、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比较制度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适应理论等。但在制度变迁理论的综述中,不能忽略制度变迁理论集大成者诺思的思想,从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不断转变中,也可以领略到制度变迁理论的复杂性。诺思的制度分析理论包括三个不断深化的部分。在20世纪80年代,他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导致制度变迁的经济力量,其基本结论是:制度变迁产生于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的不均衡,因此,制度总是朝着有经济效率的方向演变,产权制度的完善是这一演变的重要保证。这就是他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提出的制度变迁效率假说的基本观点。但由于制度变迁效率假说不能解释无效率制度大量存在这一事实,到20世纪90年代,诺思基本放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用交易费用理论建构制度分析体系,通过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引入意识形态理论和国家假说,尤其是在《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中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逐步完善,使诺思的制度分析理论体系在分析长期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上更具有解释力。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种被选择的制度,一旦具有了自我增强机制,就会被锁定在既定的轨道上,难以摆脱。自我增强机制来自于制度的四个效应,即规模效应、学习效应、网络效应和预期效应。近年来,随着对非正式制度研究的深入,诺思在路径依赖理论的基础上,又引入了认知模式的概念,主要研究人类的认知模式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并以认知模式为基础,开始重新构建新的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框架。

诺思把认知模式理解为心灵在环境反馈之前对环境所作的预测或期望,显然,这是一个含有行为能力的概念,制度变迁最深厚的根源就包含在这种行为能力之中;认知模式可以被修正、改进或

被彻底否定,这一过程是通过学习的试错过程进行的,这说明在环境、认知模式、学习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会产生两个结果:一是认知模型的变异性。行为主体在面临新问题时就会启动自己的心智模型,针对环境问题提出某种解决办法。如果解决成功了这种经验就会被累积,并被运用于更广泛的问题的解决,即通过“表征的重新描述”(所谓“表征的重新描述”是指这样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原先用以解决环境中某个特定问题的知识被重新安排)来解决更大范围内的一系列问题。如果失败,当事人首先要寻找类似的替代性的解决办法。如果还不成功,就会尝试新的方法。这就会使已有的认知模型发生变化。二是认知模型的相对稳定性。当环境反馈多次确认同一个认知模式时,那么这个认知模式就以某种方式“稳固化”了。这种相对稳固的认知模式就是“信念”。

制度的行为基础是什么?这是制度分析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诺思通过认知模式使行为同制度之间的关系明朗起来。所以,要理解认知模型,就首先要对行为经济学对制度的态度进行了解。行为经济学认为,在不确定的状态中,一个只有有限理性的人只有通过制度(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才能在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限制性选择的同时,对其他人的行为进行特征性的预测。这一制度与行为的关系是建立在行为经济学对制度起源的假定上的。在行为经济学看来,制度起源于个人在面对不确定性时的一种努力,这一努力的结果(在哈耶克那里主要是一个自然的结果,个人的努力只是其中的很小的部分,并起着较小的作用)构成了人们对“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一种认识结构,这样的认识结构是以“共有信念”的形式存在。

从诺思近期的制度变迁理论中可以看出,他已成了一个制度

演化论者,尤其是他的制度变迁的“适应性效率”观点的提出,表明他已彻底地放弃了新古典的静态的制度均衡分析方法。他的制度演化思想借鉴了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纳尔逊的经济演化论、青木昌彦的进化博弈理论,并从格雷夫那里接受了历史对制度变迁是重要的这样的观点,但他仍坚持制度变迁中个人的能动性,认为部分的制度是可设计的。

3. 国内对中国转型及经验的研究

概括地讲,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按其方法的研究侧重点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新古典经济学视角下解释经济转型的一般模型。这一领域是国内对转型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在解释经济转型的一般模型方面,有影响的观点主要有:林毅夫(1994)的战略转型理论,樊纲(2004, 2005)的转型经济体制结构指数理论,吕炜(2005)的经济转型过程、绩效、目标三位一体分析方法等。在对中国转型经验的总结方面,主要有张军(1997)、盛洪(1996)等对双轨制的价格改革何以促进计划体制转型的解释。

第二,新古典经济学视角下解释经济转型的区域模型。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特殊性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地区竞争模型的研究而进行的。主要有钱颖一(1993)的财政联邦主义模型以及“M”型行政组织理论,张维迎等人的 Li—Li—Zhang(1996)模型。政府竞争模型在中国有很强的经验基础,但由于这一模型是一个竞争决定绩效的逻辑展开式,因此仍难以摆脱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诺思悖论”。

第三,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转型研究。这一领域的文献,主要集中于由张曙光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制度变迁案例研究》中,其中,杨瑞龙(2000)的“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假说认为,中国制度

变迁方式将依次经过供给主导型、中间扩散型和需求诱致型三个阶段的转换。改革之初,是政府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方式(供给主导型)与制度选择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间发生冲突,在权力中心主导制度变迁的方式中,微观主体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同样面临着高昂的交易费用,如制度创新中的“搭便车”问题和意识形态刚性等,无法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此时,由具有独立利益目标的地方政府担当沟通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意愿与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需求的承上启下者,就成了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并逐步完成向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

金祥荣(1996)以“温州模式”为案例,把供给主导型、准需求诱致型和需求诱致型三种制度变迁方式的并列共存作为前提,认为在标准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解放思想的摩擦成本等于零,因而可把解放思想的摩擦成本大于零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称之为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多种制度变迁方式并存和渐进转换假说”。

第四,转型经济中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解释。赵伟(1997)把“温州模式”理解为一种新古典区域工业化范式,他把“温州模式”和发端于英格兰西北部兰开郡的欧洲古典工业化作了四个方面的比较,认为“温州模式”在创业资本或原始资本的获得、企业组织形式的演进、发展过程中的制度环境、促成工业化快速起步的原因四个方面都具有欧洲古典市场经济工业化早期发展的主要特征。这种新古典区域工业化范式的主要特点,一是微观上企业产权明晰;二是资本形成结构上的内源性特征明显;三是市场结构上区际性贸易和对国内市场的依存度极高;四是工业化的产业选择传统性与技术选择适宜性。

史晋川(2004)运用格雷夫的历史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从人